关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几个问题

乔 好 勤

中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成就卓著,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目著作和杰出的目录学家,清代以来竟然在学术界占了显赫的地位,成为传统“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风尚所趋,使大批著名学者涉足于目录学研究的行列。

但是,以往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总结大多着眼于书目本身,较少讨论书目之所以产生和发展之故;大多注重于个别书目方法,而较少分析书目工作的组织管理;大多强调古典书目的利用,较少从目录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高度进行全面的分析。

本文拟将中国古代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看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联系的和整体的观点,对古代目录学产生和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起源

“目录之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苏象先所著《苏魏公谭训》,系统的目录学理论著述郑樵的《通志·校讎略》也产生在南宋时期,但是目录学作为一种指导书目工作的理论和学术思想是早已存在了。

《四库全书总目》“目录类”小序说:“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仿也。”是说目录学起源于东汉。其实远在郑玄以前,刘向、刘歆不仅多次使用过“目录”一词,而且编撰了体例完备、编排有序、学术水平很高的书目著作《别录》和《七略》。所以许多学者否定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认为中国目录学发端于二刘。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刘氏父子以前,目录或者说目录学的萌芽就早已存在了。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就肯定:“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又说:“惟《周易·十翼》,有《序卦传》,篇中条列二十四卦之名,盖欲使读者知其篇第之次序,因以著其编纂之意义,与刘向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之例同,目录之作,莫古于斯矣。”这种目录学起源于春秋孔子说在目录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唐代长孙无忌、魏征等人却认为目录的产生比孔子删定六艺早得多。《隋书·经籍志》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不过,《隋志》作者未能见到古代目录实物,也未看到详细文字记载,所以他们说:“体制烟灭,不可复知”。姚名达根据这一推测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考证,认为殷墟卜辞第三十六坑毫无残缺地保留了全年的甲骨,首片尾尖有樊(即册六)、它甲尾尖有𠄎(即编六),“证明当时典藏已有法则”,此即“目录之渊源”。^①

目录是作为“纲纪”“典籍”,保管和利用典籍的工具而出现的。所以,“典籍”的大量存在是目录产生的首要条件。现在有足够的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可以证明,远在殷商时代,不仅有了大量图书资料,而且开始了委派专人进行系统的管理。文献记载,如: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国语·晋语》：“有夏商之嗣典，……奕仲之官守焉。”

《吕氏春秋》：“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出土实物，如安阳小屯的殷墟卜辞见存的就有数万片。在这些甲骨卜辞资料中，已经证实有：𠄎、𠄎，即“册”字；𠄎、𠄎，即“典”字，典字形义，两手捧书，有典藏管理之意；上举册六、编六，和在一腹甲上发现的“三册，册凡三”，就有编列总计的意思；郭沫若发现骨白刻辞中有“帚𠄎示七笈”，“帚𠄎示三笈”等字样，认为相当于近代线装书的“写书根”，^②意思是妇姁或妇𠄎查阅或归档了几包甲骨。李亚农解释说，卜辞是殷王朝的“大事记”，重要国家文献，数量很多，既派专人保管检取，必有一定排列次序。^③

所以，说殷商时代已经有了书目工作的雏形，或者说应“视为我国目录学的胚胎时期”，^④并不纯属揣测，是可信的。这样算起来，我国目录学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学术思想活跃，纷纷著书立说，图书数量急剧增加，《墨子》说：“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由于奴隶的解放，生产力得到发展，农业经济大大前进了一步，促进了农学、天文学、医学的发展。由于地主阶级的崛起，诸侯割据，文士们奔走游说，促进了哲学和各种思想的发展。长年的兼并战争，促进了军事学、地理学、制器技术的发展。这一切都不能不参阅大量的图书资料。孔子整理古代典籍，就搜集和参考了夏、商、宋、杞等故国的文献，而且深感文献的不足。

孔子出于政治和教育的目的整理文献，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他的态度是“述而不作”。“述”就是对古代文献加了一点说明，以便学习理解，这就是所谓的大序和小序。从流传下来的《诗》《书》之序可以看出，其目的正是“言其作意”，^⑤即揭示本书或本篇写作目的和意义。人们把这种“序”或集中附于全书之后，或别出单行，就是一书之目录。故《七略》说：“《尚书》有青丝编目录。”^⑥由于“序”在宣传图书指导阅读方面确能发挥作用，所以许多学者起而仿效。《逸周书》、韩、鲁、毛诗都写有序。现存最完整的较早的一篇序是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中的“序意”。之后100年，淮南王刘安在所撰《淮南子》中也写了一篇“要略”，许慎解释说：“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真正起到了提要钩玄的作用。序，作为揭示图书内容、指导阅读的有效形式和方法，被书目工作者所接受，逐渐演变为目录中的类序和叙录。

单有揭示记载一部图书的方法还是不行的，必须有组织和排列一批相关的图书的方法，才能组成一部书目。而排列图书的为人们所接受的最早的方法就是分类。分类，就是荀子所说的“辨同异”，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手段。图书也是一种“物”，所以根据图书的基本属性——其内容和体裁进行分类就成为管理图书、利用图书、编制目录的重要依据。

章学诚《校雠通义》说：远在上古，“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所以“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周官》上虽然记载有太史掌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小行人掌礼籍等等，但这只能说明各种官员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管理各种图书，把它看作图书部次未免牵强附会。对后来图书分类影响较大的是春秋以后的学术分类。孔子所定六艺就是将学术分类用于图书分类的第一次尝试。以后，荀子将学术分为六派，庄子分为七派。到西汉的司马谈则总结前代学术分类思想的成果，将学派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对刘歆《七略》中“诸子略”的分类产生很大影响。^⑦

我国古代书目工作，在长期的孕育和萌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揭示图书和组织图书的目录学知识，著录、提要和分类方法逐渐成熟起来，为系统的目录著作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使图书文献遭到空前浩劫。汉兴，改秦之政，“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①“百年之间，书如丘山”。②然而，简书丝编，易于脱乱，对图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编目已是势在必行。汉成帝河平三年八月，一方面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同时诏光禄大夫刘向领校中秘书。他们每校完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当时将所奏之录，集中起来就是《别录》。业未竟而向卒，哀帝复使向子刘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③

《别录》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提要目录，《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这两部目录“巨著”④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目录学进入“系统目录学”时期。其主要标志是：①有明确的编撰目的和指导思想；②较为成熟的书目形态；③著录款目基本统一；④形成了一定的分类体系。由于刘向刘歆在目录学方法和书目编制技术上的巨大贡献，许多学者认为“目录之学，始于刘向父子。”⑤“目录之学，启自西京。”⑥认刘氏父子为鼻祖。但是，诚如鲍鼎所说：“谓目录成为专著，始于向歆则可，谓目录之学始于向歆，似非确论。”⑦

中国古典书目的结构

古代书目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各类型书目有着不同的结构特点。南宋郑樵已开始把“目录”分为四类：总目、家藏总目、文章目、经史目。⑧至明，胡应麟则分为三种：录一家之藏者，志一代之有者，并收往籍之遗者。⑨清龚自珍则分为三支：朝廷官簿，私家著录，史家著录。⑩近现代刘纪泽、余嘉锡等把古典书目分为：兼有小序和解题者，有小序而无解题者，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⑪郑、胡二氏是以书目收书范围而分，龚氏是以书目编著者而分，刘、余等人是以书目体例而分。三者所据不同，结果却基本相似。总的来看，古典书目的构成大体包括这样几个部分：基本著录款目、类序、提要。有人称之为“三要素”。

基本著录款目包括：书名、著者、篇卷、版本注记等。这是构成一部书目的最基本的要素，是舍此不可的。它反映了图书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利用书目查寻图书的基本手段。但是，仅以基本款目编成的目录，不可能很好地辨章学术源流，以及更深入地揭示图书内容，因而为一般目录学家所反对，被称作“甲乙簿”。《旧唐书·经籍志》、元《秘书监志》、明《文渊阁书目》以及明清时期的一些私藏目录，皆属此类。

这些基本款目在著录时以什么为标目，即什么写在最前面，是目录学家长期争论而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汉志》基本上以著者为标目，《隋志》则改为以书名为标目。《旧唐志》仿隋，《新唐志》随汉。这种多次的反复引起了目录学理论家郑樵的注意。他把以著者为标目称作“以书类人”，把以书名为标目称作“以人类书”，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主张“以人类书”。⑫章学诚虽然从名词上看是反对“以人类书”，主张“以书类人”的，但他的“以书类人”的含义却仍是以书名为标目。⑬所以说章学诚和郑樵在这点上并非意见相反，而是完全一致的。

序，包括总序和大小类序。孔子删定《诗》《书》，曾“为之序，言其作意”。大序统摄全书，小序单言一篇。《七略》“辑略”中的总序和各类小序就是由大序的发展。所以阮孝绪说：“其一略为六略之总最。”⑭《汉书·艺文志》散“辑略”之词，随类附于其后。据《隋书·经籍志》

说，王俭《七志》曾“作九篇条例，编乎卷首之中”，但“文义浅近，未为典则”。《七林》既有总序，又有类序，以“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七录》是否有类序不得而知，但总序是有的，并且流传了下来。以后的《隋志》、《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等皆有大小类序。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有凡例二十则，部有大序，类有小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纲挈领，指导治学，为学者们所称道。章学诚对类序特别推重，认为“此最为明道之要”，然而“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②所以晋隋六朝官簿、新旧唐志和一些私家目录，或因草率成篇，或因力不从心，有的只有总序而无类序，有的总序类序皆无，致使学术源流无从得知，大大降低了书目的学术价值。

提要，又称叙录、解题，是书目中解释题意，介绍作者，揭示图书内容，评论学术得失的主要方法。张西堂论“解题之体”包括四项：①撰人传略；②本书纲要；③版刻异同；④考目得失。^③余嘉锡谓叙录功用有三：①论考作者之行事；②论考作者之时代；③论考作者之学术。^④所以学者以提要的有无来评价书目著作水平的高低。解题的编撰成为目录学家探讨的重要课题，逐渐形成三种形式：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

叙录体是刘向吸取古代书序中的小序形式，又根据整理记籍的实际需要而创立的。每一书已，向辄“录而奏之”的“录”就是记录本书校讎经过、图书内容、作者身世、学术价值的“报告单”，所以各篇叙录都比较长。后来刘歆又“撮其旨要”，“种别”而为《七略》，所以《七略》也有叙录，但要短小精练得多。

叙录体书目是我国书目的正宗。唐初魏征就以叙录的有无和水平的高低来评价书目著作的得失。朱彝尊曾就《崇文总目》来论述叙录体例时说：“《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为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著《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⑤孙诒让也曾指出：“中垒校书，是有别录，释名辨类，厥体甚详。后世公私书录，率有解题。”^⑥章学诚则说得更为明确：“每校一书，必撰一录，足以见学术源流者，实千古编目之良法。”^⑦

传录体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志》说，荀勖编《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曾经解释说：“所谓‘题及言’者，著录书名及略作解题也。”“其书当与后来之王俭《七志》同一体例。”《七志》体例则何？《隋志》说，它“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传”字，过去有人解释为人物传记，其实“传”即传注，也就是简要的解题。《隋志》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无所变革”，说明这一时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体例——传录体。它“不述作者之意”，不评判学术得失，只对作者作简要介绍和对书名作简单的解释。其形式当简于《七略》，而详于《汉志》。历代目录学家即肯定魏晋南北朝的书目有“言”有“传”，又攻击其“但记书名”、“甲乙计数”，实在是一种疏忽和误解。

辑录体是将一书的有关资料——序、跋、题记、历代书目叙录、注释、列传中的叙述文字汇集于书名之下，供研究参考之用。其体例是从类书的辑录方法演变而来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是我国第一部辑录体书目。他不但辑录了晁、陈书目中的叙录解题，还辑录了汉、隋、唐、宋各朝艺文志、《崇文总目》、史书列传、各书序跋等文字资料，搜罗丰富。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章学诚《史籍考》皆仿其例，形成了我国古典书目提要的一种特殊形式。

古代目录学家一向把有序有录的书目奉为上乘。这种书目不仅能“论其指归，辨其谬误”，“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而且能“籍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⑧“补正史缺遗，

刚明行要，资学者博识。”^⑧可称“择撰群艺，研核臧否，信校讎之总汇，考镜之渊微。”^⑨而无序无录之书目，仅为图书记录，取便稽核，是为书目的下乘。

古代书目工作的组织和理论研究

我国古代书目工作大体包括两种类型：宫廷书目工作和个体书目活动。

宫廷书目工作是皇帝下达圣旨，委派大臣主持，选择一代著名学者组成编目班子，依各人所长分工负责，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来从事图书的整理和编目的。其所成就，即历代官修总目。

宫廷书目工作一般机构庞大，组织复杂，人力雄厚，物质有所保障。在开展图书编目之时，大都要下令全国开献书之路，搜求遗书，校讎与编目同时进行。因而所编书目收录丰富，著录可靠，基本上能反映一代之藏。宫廷书目工作班子中大多是当代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学识渊博，有丰富的古籍整理、编纂和目录学知识，所以辨真伪、鉴版本、勘误谬、考源流、论学术十分精详。所编书目大多有序有录，体例完备，学术价值较高。但不要忘记鲁迅先生的遗教：“须注意”是“钦定”的”^⑩。

我国历代均有校书编目工作开展，其中规模较大、历时较久、成绩显著者有四：

西汉河平三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⑪参加校书编目工作的还有杜参、班游、刘伋、刘歆等，经二十年才方就，成《别录》、《七略》。

唐初至玄宗朝校书编目工作绵亘四、五十年。初，“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讎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显庆中，罢讎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值酬佣，择散官随番讎校。”^⑫这次校讎编目不仅人手众多，还采取了计件付酬和选用无事可做的“散官”轮流参加的措施。开元间，褚无量、马怀素受命分职“整比”。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其有与四库书名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⑬马怀素曾建议：“召宿学臣儒就校谬缺。”此时入阁参加校讎编目工作的有尹知章、王直等二十七人，或“分别撰次”，或“是正文字”，有副使，有判官，组织周详，分工明确。又“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九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⑭可见工程之大。褚、马先后病卒，元行冲代总其事，奏绍伯、利微、毋巽等二十余人，“入校丽正书”，开元九年十一月，上《群书四部录》二百卷。

宋代亦十分重视校讎编目工作。“咸平元年十一月，以三馆秘阁之书岁久不治，诏朱昂、杜镐、刘承珪整比。著为目录。三年二月，昂等受诏编馆阁图籍目录。”^⑮景德四年，皇帝亲登太清楼，手执书目，令黄门侍郎举其书，一一核对。景祐初，又诏王尧臣、欧阳修等七人组成编目班子，五年成书，赐名《崇文总目》。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全由乾隆帝一手指挥。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一面委各省采进搜缴图书，一面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有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王念孙等著名学者参加，组成校理编目机构，分工负责，达十多年，方成《总目》和《简目》。

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宫廷书目工作成功的原因，同时它又是阻碍书目工作全面发展的障碍。宫廷书目工作历时一久，难免组织松懈，消极怠工，敷衍塞责，“渐启挟持、讹诈、骚挠、多事之渐”，对书目工作的发展是“无益而有损”的。^⑯私人书目活动就是在对宫廷书目工作的不

满和抗争中产生的。刘宋王俭撰《七志》、唐毋煗编订《古今书录》都是出于对官修书目工作的不满而另起炉灶。

除史志目录外，两汉未见有私人编目的出现。真正的个人书目工作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王俭、任昉、阮孝绪、刘杳等都有书目之编。唐以后，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私人藏书激增，私人书目工作有了发展的条件。个体书目工作者大多一人穷年累月地搜求考索，皓首告老为一目录。如阮孝绪“晨光才启，湘囊已散，霄漏既分，绿帙方掩”；⑧尤袤“闭门谢客，日记手抄”⑨；陈振孙直到年老告退还在修订他的《直斋书录解题》。如钱曾竭“二十年之心力”校勘编目；黄丕烈“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中。”⑩其笃心簿录，认真耕耘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另外，还有一些军事将领，于戎马征战之余，苦心搜辑，著录成册。有一些学者，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博采详考，编成书目。前者如明代的高儒、周弘祖等，所编书目著录通俗文学作品较多。后者如高似孙、朱彝尊、章学诚、殷仲春、梅文鼎等所撰皆专科学目。这些武士和学者的书目活动，是我国古代书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体书目工作的产生，促进了我国书目工作的发展，但是个体书目工作者之间逐渐形成的隔绝和封锁，使书目工作领域里呈现“小农经济”状态，形成孤立、松散的书目工作结构。这种结构逐渐地成为书目工作前进的障碍。

我国古代书目工作的实践活动是丰富的，但是对目录学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却相当薄弱。现在保留下来的最早的理论著述要算《七录序》了。在这篇序言里，阮孝绪不仅撮述了前代书目工作的历史，更主要地是论述了他对类目分并离合的见解。魏征等所撰写的《隋书·经籍志》总序和“簿录类”小序也是非常珍贵的目录学文献。在总序里魏征论述了经籍的产生、演变、聚散及其整理编目的必要性，总结了唐以前书目工作的历史，并以能否剖判学术源流、述作者之意为标准，对历代所编书目进行评价，提出了他自己编撰书目的方法、步骤和理论基础。在簿录篇小序中论述了簿录家的因革渊源。毋煗的《古今书录序》除了对书目功用进行了透彻的议论外，还可看成是一篇对书目工作进行商榷的文字。

余嘉锡说古代“无治目录学之书，”⑪这是欠妥当的。南宋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就是目录学理论的专门著述。这一点，清代学者李兆洛早就指出过。郑樵在《校雠略》中对图书分类、图书著录、注释体例、编目原则及图书采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记百代之有无”、“编次必谨类例论”、“泛释无义论”，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

清代目录学家群星灿烂。他们在长期的书目工作实践中，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理论探讨。他们认真钻研、悉心考究的甘苦于书目著作的序跋和读书志之类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四库馆臣编制《四库全书总目》时对目录学理论的研究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总目》的凡例、总序、目录类小序和各书目著作的提要这一研究的重要成果，内容所及几乎包括古典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所有问题。清代目录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目录学家之间的商榷讨论。学者们对大家所关心的共同问题，或著书，或通信，进行学术论辩，而且这种论争波及到文史之学的许多领域。其往来商讨之迹从清代的许多信札笔记中可以窥见。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研究专著《校雠通义》就是在这种论争中产生的。

《校雠通义》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的总结。章学诚在总结我国古代书目工作实践和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理论体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论是以他的“道不离器”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是他的“六经皆史”说在目录学中的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要求目录学和学术史结合起来，达到“部次条别，申明大道，叙

列九流百氏之学……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目的。章学诚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理论出发，进一步论证了书目中类序、提要、著录款目、分类、互著别裁等方法的重要作用，大大提高了书目的价值和目录学的作用。

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高峰。直至步入新目录学之前，古典目录学家所做的工作都只不过是这一理论的发挥和解释，实践和应用，很少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

注释

-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 ② 郭沫若《卜辞通纂》
- ③ 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
- ④ 王重民《普通目录学》
- ⑤⑥⑦⑧ 班固《汉书·艺文志》
- ⑨⑩ 《文选》李善注引《七略》
- ⑪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 ⑫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 ⑬ 李笠《目录之名称及其内涵》
- ⑭ 刘纪泽《目录学概论》
- ⑮ 鲍鼎《目录学小史》
- ⑯⑰ 郑樵《通志·校讎略》
- ⑱ 胡应麟《少师山房笔丛》
- ⑲ 费自珍《定庵文集》(续集)
- ⑳㉑㉒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 ㉓㉔㉕㉖ 章校诚《校讎通义》
- ㉗㉘ 阮孝绪《七录序》
- ㉙ 张西堂《论目录之体例》
- ㉚㉛ 朱彝尊《曝书亭文集》
- ㉜ 孙诒让《稽古述林》
- ㉝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
- ㉞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
- ㉟ 许寿堂《亡友鲁迅印象记》
- ㊱ 刘昫《旧唐书·经籍志》
- ㊲ 《唐会要》卷六十四
- ㊳ 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
- ㊴ 《玉海》卷五十二
- ㊵ 杨诚斋《遂初堂书目序》
- ㊶ 王芑孙《陶陶室记》

(上接第 95 页)

朱彝尊在《经义考·著录篇》中评论说：“班固《汉书》依《七略》作《艺文志》，诚良史之用心，而史家体例之不可少者也”。《汉志》以后，正史中以例编撰《艺文志》(或《经籍志》)的有六种；清代以来对史书缺《艺文志》的作了补撰工作，往往一部史书就有好几家；据统计，这类补撰的史志有五十余家，在目录学领域形成一个小小的流派。丰富的史志书目为我们了解历代图书文化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就《汉志》的学术价值而论，首先表现在对先秦以来所有的图书进行了整理编次，使杂乱的古今图书从此有了一本清册，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古代图书的一些情况，全凭它的著录和启发。其次，它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把当时的图书系统清晰地著录在类表里，通过这幅分类表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末年以前整个文化

学术的概况。另外，它在著录部次图书的基础上对文化学术的各个门类分别给予评论，尽管其中夹杂一些阴阳五行的术语，但基本上已脱离了神学的轨道，而就具体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作了人文主义的解释。这些评论和总结，可作为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的依据。

注释：

- ① 郭沫若《就当前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见《光明日报》1959年4月8日。
-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
- ③ 范曄《后汉书·班彪列传》。
- ④⑥ 班固《汉书·叙传》。
- ⑤ 班固《典引叙》，见《文选》卷四十八。
- ⑦⑧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
- ⑨ 邵晋涵序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
- ⑩ 《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上编。
- ⑪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
- ⑫ 章学诚《校讎通义·内篇三》。